

晚清今文學崛起的社會史理路 ——讀艾爾曼近著

● 楊念群

Benjamin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對清初乾嘉「國學」的研究大致屬於思想史的範疇。近些年興起的學術史更刻意模仿清人剔除「微言」之法，希圖從思想的「內在理路」去尋究文本自身的意義。余英時曾撰有〈清代思想史研究的一個新解釋〉一文^①，通過從「尊德性」向「道問學」話語轉型的精緻描述，基本上總結性地釐定了清代國學研究的特徵基調。這種解釋的合理性大約可定位於乾嘉時代，可是這個框架似乎仍很難毫無遺漏地把握這一時期思想脈系中偶爾閃現的異常之象，常州學派向儒學正統棄置多年的神秘公羊學明送秋波，似乎多少昭示着文本解釋原則的有限效力。於是

把「文本」與「語境」再度結合起來進行歷史的「重構」(reframing)，就成了艾爾曼(Benjamin Elman)的核心敘事手段。

艾爾曼在別的場合就說過，寫這麼一部關於清代公羊學派的著作不是想取代人們熟知的晚清康有為敍說的今文經學故事，而是揭示出與其同父(今文學派)異母(地緣關係)的另一個同胞般的影像。因為，常州學派與晚清公羊學的相異之點顯然不能單以「內在理路」來加以詮釋，而與文本之外的語境因素如常州精英的親族結構及其與帝國正統意識形態的衝突互動實相關連。

與其第一本著作《從理學到樸學》(*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②有所不同，如艾爾曼自己所說，由於更着重地強調思想的根源狀態及其與周邊發生地區的有機聯繫，《樸學、政治與家族》一書更具有

常州學派與晚清公羊學的相異之點顯然不能單以「內在理路」來加以詮釋，而與文本之外的語境因素如常州精英的親族結構及其與帝國正統意識形態的衝突互動實相關連。

儒學從晚清國家正統中顯示出異議並非始於鴉片戰爭後，而是始於晚明。艾爾曼於是設問：為甚麼在西方入侵以前，儒家士大夫們已經顯示出對異端政治話語的興趣，而且為甚麼這種濃烈的興趣偏偏集中於常州一隅？

江浙地區的學術傳承線索背後，都有一部龐大的家族史以資註腳，使之形成不同於官學公共考試系統的私人漢學傳統，其背後的邏輯隱語可能表述為：是否擁有「文化資源」是區別官私學的關鍵。

「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 的特色^③。全書的理論框架是建立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論基礎之上。例如第一章中提到的「文化資源」(cultural resources)一詞，即來自於布迪厄的重要概念「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但艾爾曼在運用此概念時，則以「資源」而非「資本」為核心理念分析常州學派的起源，因為直到十九世紀，晚清中國尚沒有堪與西歐比較的資本主義形式的經濟與社會系統。

正是出於「語境化」的考慮，艾氏研究常州學派並未依循習以為常的學術史研究尋繹「內在理路」的方法，而是投目於思想崛起的環境。他發現，儒學從晚清國家正統中顯示出異議並非始於鴉片戰爭後，而是始於晚明。在被忽視了多個世紀後，今文經學再現於十八世紀末，它的鼓吹者正重新追溯被十七世紀拋掉的政治議事傳統。艾爾曼於是設問：為甚麼在西方入侵以前，儒家士大夫們已經顯示出對異端政治話語的興趣，而且為甚麼這種濃烈的興趣偏偏集中於常州一隅？具有神秘政治寓言色彩的公羊學復興，使人們有必要重新考慮儒學政治文化內部的緊張及其淵源。

艾爾曼常常把常州今文學群像與康梁做對比，兩者的最大區別乃在於：康有為使今文運動變成了上層制度變革的預言神話資源，這種資源的獲取缺乏基層的社會根基，只是游士邊緣人的新興知識群體政治話語的隱晦表現形式，它基本上是一個相當個人化的選擇；與之相反，十八世紀的今文運動則深深植根於區域性社會的生活範疇之中。

常州今文經學的創始人及後繼者莊存與和劉逢祿的家庭，在1450-1850年間的常州地區一直佔據着很高的社會地位，而其學術傳承的縱向網絡又是和宗族親屬之間的橫向關係緊緊契合在一起的。這樣看來，今文學崛起自然就不是一個如早期乾嘉學派那樣比較單純的學術事件，亦非如康氏公羊學那樣的「政治事件」，而是在兼有二者特色的同時，成為一個奇異的「家族事件」。既然擁有「家族事件」的特質，常州今文學的興起便不能純用對文本內在理路的解釋，這與學術史研究區分了開來；它亦不能純用政治史的範型，這又與晚清經學的「現代化敘事」區分了開來。

令人感到詫異的是，江浙地區特別是常州學派的學術傳承線索背後，都有一部龐大的家族史以資註腳。如莊氏家族與劉氏的世代聯姻關係，使莊、劉的今文學傳承被生動地展示為家族血統與文化資源蘊育的一個邏輯結果。這與康有為今文經學僅僅與晚清的知識份子政治能動主義保持合理關係的圖像是大相逕庭的。這裏其實亦涉及私人與國家學術體制傳承的脈系問題。清初以來，江浙地區形成的知識圈由於介入了「家族事件」的影響，使之已形成了不同於官學公共考試系統的私人漢學傳統，其背後的邏輯隱語可能表述為：是否擁有「文化資源」是區別官私學的關鍵。中國的科舉考試儘管已為貧寒之士提供了入階官場的可能性，但私學傳承的氛圍從基層社會和區域界劃而言還要靠文化資源的鼎力支持。比如蘇州的惠棟家族以及江藩、戴震、

王念孫、王引之之間的宗族師友網絡成為形構漢學傳統的潛在背景，不把它們揭示出來而僅僅進行文本研究的偏狹性是顯而易見的。

同時我們還會看到，在「私學傳統」通過家族網絡定型拓展的同時，家族網絡也會為官學體制輸送血液，這是個平行互動的過程。西方歷史學家估計，近代個人往往能從血緣團體中自治出來，但是在十八世紀的中國則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在區域性的基層，家族並非抽象的社會組織，地理—歷史—血緣構成的三要素，顯然使富裕的紳士階層和家族成員比貧困者擁有更多的地方優勢。在江南，家族、社會和經濟力量很快與公共考試系統成功地結合在一起。經濟剩餘產生的富裕家族在國家考試過程中能得到很好的教育，這又導致了家族因素之外的經濟和政治力量對資源的獲取，更多的教育機會總屬於有更多知識儲備和控制家族事物的那些統治家族的有力成員。

以莊氏宗族為例，當從北方移民至常州時，莊氏通過聯姻和科舉博得了基層地位。在莊氏家族中，清代共有97人獲得過功名，比明代的7人多出十數倍，其中29人獲得進士，莊氏由此成為數代在政府中謀職的「專業化的精英」(professional elite)。科舉考試要求古典式教育，富裕的家族通過分享區域性的文化資源獲得功名。

十八世紀莊氏家族的力量和影響不僅建立於自身血緣親族的基礎上，還與外姓宗族如劉氏發展了緊密的外部聯繫。在莊、劉關係的組合形式中，我們能看到更廣闊意義

上的國家水平網絡如何與地方一級的家族組織相重疊及其效果，以及國家與地方之間的相互關係。劉氏作為北方人(河南鳳陽人)是隨朱元璋進入常州的，最初作為外來者在地方精英圈中素無顯名，直到十八、十九世紀，莊、劉兩家的聯姻並沒有因政治觀點的不同而受到影響。通過世代聯姻，莊、劉兩家不僅在地方社區中據於執牛耳地位，而且聯手交替在中央一層機構中擔任要職。聯姻如同滾雪球，聯姻越頻繁，進入上層社會的人數密度就相應越來越高，相互促動的結果使劉氏通過聯姻終於與莊氏的官場關係接上了頭，進而帶動了劉氏一族科舉的興盛。劉氏科第越盛，反過來聯姻的機會也會隨之增大。「科舉」與「聯姻」互動的局面顯示出莊、劉二氏的勢力不僅在地方上坐大，而且對上層的滲透也越來越厲害，至十八世紀中葉，常州家族勢力已居於北京政治的核心地位。

行文至此，我們無疑會強烈感受到所謂「文化資源」的力量，因為它成功地把地區性的家族聲望轉化為國家層面的政治勢力，反之亦然。那麼闡述這種文本之外的「語境化」因素的意義究竟何在呢？

我認為其意義可表現在如下幾個層面：

一是使那些已摒棄「微言大義」多年、心如枯井般的乾嘉敍事者們又開始向疏離已久的政治話語頻頻招手，這是一個反向復歸的運動。探討清初學術興衰的傳統聲音從文本外的意義來說，早已經把漢學中興的緣由推諉給了文字獄；從內在理路的解釋而言，學者們早已背熟

劉氏通過聯姻終於與莊氏的官場關係接上了頭。「科舉」與「聯姻」互動的局面顯示出莊、劉二氏的勢力不僅在地方上坐大，而且對上層的滲透也越來越厲害。

用探討清初學術興衰的傳統公式去套常州學派，似乎都不合尺寸。因為常州今文經學的崛起，只能從國家與社會的重新互動中尋求解釋。

了「尊德性」轉趨「道問學」的老公式。可是用這兩個框子去套常州學派似乎都不合尺寸。常州學派恰恰是「內在理路」研究和政治迫害假說的例外者。常州今文經學的崛起只能從國家與社會的重新互動中尋求解釋。艾爾曼曾經提示到：莊存與在1780年轉向非正統的公羊學與莊、劉兩家退出全國政治舞台的時間相一致，而且與和坤的政治行為有關。那麼我們就不難明白，作為官一紳一體的莊、劉二氏，當發現和坤貪污中飽而無所收斂，其行為之發生又是與官學體制內的價值觀念相契合時，也就不得不從宗族血緣滋養着的基層非官學土壤中尋求對抗官學的資源。在這裏，官一紳一體的特定行為角色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僅僅由科舉入仕為官，與基層的聯繫往往無法達至莊、劉二氏的深厚程度，或無緣浸淫江南文化圈的非正統型思想的魅力，所以自然不會標新立異地反叛；反之，如果僅僅是一介鄉董士紳，則有天高皇帝遠之虞，根本不會感受到政治軸心發生事件的衝擊力度，他們的言行只能鑄造漢學的培養基，而不是政治的轉換器。只有如莊氏以血緣宗族的擴展力兼跨國家與社會的中樞，以致自身即成為二者的聯動符號者，才真正具備操縱與轉換一代政治話語，甚而扭轉一時之學風的大氣魄。

可是無庸諱言，常州學者顯示出的「語境化」表現恰恰是入了經學傳統話語的圈套。清帝國的權力與以往皇家一樣很少呈赤裸狀態，它經常會披着證明自我合法性的儒學外衣，從經學中引伸出來的政治語

言，代表了帝國意識形態的聲音，成為描述其存在理由的工具。政治權力也是通過儒學的道德和政治哲學折射出來而轉化為強制性的制度和符號系統。從應然的狀態而言，若要疏離意識形態的控制，就要把其中論證權力合法性的「微言大義」從經學話語中剝離出來，把它還原成純粹的「語言狀態」。乾嘉學術特別是古文經學的復興，無疑會在非政治意義上確立經學的獨立品格，但是經學傳統一旦與某一政治機緣如和坤事件勾連起來，成為政治角逐的工具，則無論這種角逐是民間性的還是官方性的，儒家的詮釋又不可避免地會跌回意識形態遊戲規則中來。我一直認為，今文經學及其相伴而生的近世經世思潮，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清代學術史自身發展的獨立品格。今文經學大師少有在學術上享有盛譽者，這與其過於急進式的政治情結有關。以往有相當一批歷史學者常常毫無保留地肯定魏源等今文經學家的政治投機取向，而沒有考慮到這種行為取向正是在反向立場上輪回進了儒學作為政治符號和權力外衣的舊式圈套。也許正因為如此，艾爾曼揭示常州學派的崛起與政治話語的互動關係，可能恰恰說明了清代學術傳統再次發生了「語境化」（而非「內在理路」）式的轉型，即「學術的政治表現形式」重新遮蓋了「學術的學術表現形式」，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轉折。

第二點值得注意的是，十八世紀今文學與晚清今文學常被近代思想史家拼接構述為相貫相聯的同質圖像，以其面具般的相似點而觀，

二者大致可同視為晚明知識界「清議」傳統的衍生與再現，即所謂「東林意識」的故態復萌。然而二者在今文學統旗幟下的人生表演，卻是被不同的組織運作機制操縱的。十八世紀的「清議」活脫脫成了常州士紳的代言聲音，和坤貪污雖說犯了眾怒，可是對之進行批判的最有效語言通道和話語表現卻具有如此強烈的區域性和血緣性的特點。

而晚清今文學群體崛起之過程與背景，與晚明和清初那種以血緣聯繫替代非血緣聯盟以作為紳士組織策略的原則是相悖的。我們看到，十八世紀的今文經學思想代表了一個地方學術流派與血緣宗族的有效合作，在劉逢祿之後，今文經學思想超越了他們在莊、劉宗族中的起源狀態，政治氣候的變化意味着公羊敘事不再要求以血緣支持作為合法性根基。十九世紀的清議組織則越來越代表一種士紳橫向的聯盟形式，在地方社會中，血緣聯繫是凝聚士紳的重要資源，但是在更廣泛的省區和行政地區，血緣構成策略已成為第二位因素。如康有為以今文學重構改革話語，就沒有甚麼血緣宗族的線索在背後進行遙控。「今文話語」已變為純粹上層知識群體表達不寧心緒的中介手段。當然，晚清今文經學的抗議色彩表現得如此濃烈，以致於到最後，持「今文話語」的人常常會犯規式地直搗堂奧去討論起制度變遷的具體問題，今文經學從而變成了與傳統經學無關的純粹政治話語。這裏邊的原因的確十分複雜，僅從組織形態而言，以非血緣性的政治組織為行為主調的晚清改革表演早已決

定了其話語形式的非學術特徵。如艾爾曼所言，這是古典經術與政治話語在「後新儒學形式」(post-neo-confucian form)下的重新凝聚。

如要對本書做總結性評述，我們可以說艾爾曼與其他論者的區別乃在於當他試圖如某類思想史著作一樣去描述常州學派思想本身時，多問了兩個一般思想史範疇外的問題：這「思想」從何而來？思想構成的背後那隻看得見或看不見的手在幹着甚麼？這類問題使曾經斷裂成兩截的「思想史」與「社會史」在新的意義上被溝通了起來。

註釋

①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載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121-56。

②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中譯本可參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社會與精神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參見艾爾曼與汪暉的對話，載《讀書》，1994年第二期。

十八世紀的今文經學思想代表了一個地方學術流派與血緣宗族的有效合作，十九世紀的清議組織則越來越代表一種士紳橫向的聯盟形式。如康有為以今文學重構改革話語，就沒有甚麼血緣宗族的線索在背後進行遙控。「今文話語」已變為純粹上層知識群體表達不寧心緒的中介手段。

楊念群 1964年生，湖南湘潭人，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講師。著有〈儒學的地域化與近代中國知識群體人格的二重取向〉、〈佛教神秘主義：《大同書》的邏輯起點〉等論文多篇。